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〇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六期 ——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11c）

【研究通信】	王年一书信摘抄	王年一
【见证历史】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与江青打交道	王广宇
【往事追忆】	北航批斗彭德怀	戴维堤
【难忘岁月】	“一月风暴”中的安徽	梁守福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研究通信】

王年一书信摘抄

• 王年一 •

〔编者按：王年一先生去世后，他生前同部分文革研究者的通信开始流传于世，其中有关于文革历史及文革研究的内容，虽然不够系统，但不乏真知灼见，现摘抄部分以飨读者。〕

1996年8月13日致何蜀——

我投给《东方》一文，关于“文革”的，看来是采用了，可是所有关于“文革”的文章，都给新闻出版总署枪毙了，要杂志社另换一批稿件。我心中充满惆怅。

1998年9月6日致何蜀——

九届二中全会的背景是：军队势力膨胀，军人在革委会中都占据主要地位，毛不放心。

实际是“四人帮”组成的林彪专案组，能那么公平？周是组长，挂名而已。

毛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唯独对林彪是十分正确的？

林死后，毛对汪东兴说：“林彪帮了我们的大忙。”汪向政治局作了传达。——这是邱会作

讲的。

谁改变二中全会议程的？是林还是毛？

2004年5月12日致何蜀——

我想写一篇《两个“文革”定义的比较》，一个，是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注1），一个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所下的定义（王力对叶永烈也讲过，《叶永烈采访手记》中有记载。《手记》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注2）

我想抓住两个问题做文章。胡乔木说“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不是林、江作出的。江文在特别法庭上反驳江青的讲话，值得推敲。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王力的定义，最可贵之处是突出了“封建性”。可贵有二：一、文革确实充满了“封建性”；二、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情况下，才会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举措。只有在极不民主的条件下，才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活动。

注1：指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注2：指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一书中的这段话：“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329页）

2005年6月1日致阎长贵——

江青并非一无是处。她是一个被权力腐蚀了的人，是一个性格被歪曲了的人。她说她是毛的忠实走狗——说得不错。她有才干。“样板戏”不宜完全否定。……江的仿毛字体，写得很不错。此人狠毒，环境使然也。不要脱离那个时代、不要脱离那个环境来评论她。好像李银桥说过，她在解放前还不错，对毛也好；起大变化的是在解放以后。李的话值得玩味。当然，江青远远说不上“伟人”，她是一个小丑，是一个“得志便猖狂”的人。为什么毛培养了这样一个人？江的私德不好……

2005年10月15日致阎长贵——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大作已拜读，写得很好。我想说明三点：（1）我的朋友何蜀也写过一篇“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估计在网上发表了。当时我的印象是写得很好。（2）我亲眼看过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康生在“七二〇”事件中在北京请示过在外地的毛，可不可以用“揪军内一小撮”一语，毛说可以，康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叶群、江青等人。（因特殊机缘，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让我看了这个档案。当时《红旗》、《人民日报》用此语，有所据。）（3）王关戚是替罪羊，但从各种出版物看来，似与此事无关。《红旗》八一社论也与王、关、戚关系不大。我估计与陈伯达也无关。——以上想法，仅供参考。手上事多，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考

虑。毛后来看到到处揪军队首长危险太大，又制止了这一提法。这是毛出尔反尔的一例。对王力，主要是对他的“八七”讲话不满。（王确有大有问题的“八七”谈话）

.....

关于江青，我还有一些想法：她出生（身）贫寒，年轻时还是奋斗向上的，她到延安，不可否认是进步之举，她在上海“失足”，是无心之过。她对老人家，显然有过不少的关心和照顾。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因此养成了她暴戾的性格（她心中有太多的怨恨，她受过几个男人的欺侮，她要报复，她有变态心理，她怕人害她，疑神疑鬼。她也有近人情的一面，如她同意了李讷晚年的婚姻，她自知不容于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断然了却自己的生命。据一位知情者告诉我，江青要李讷要回毛的书籍等物，李讷因要过而未得批准，所以对江青很反感，不久，江死去。——这是住府右街的胡乔木的一位亲戚告诉我的。我觉得研究江的空间很大。总有一天，人们的情绪化可以大大减少。）

2005年11月5日致阎长贵——

毛抛出王力，确实出于形势所逼。形势约有如下几点：

（一）王力不仅要打倒陈毅，还号召夺权。1967年8月7日以后，中央一些部委也夺权了（以前不许夺中央的权，是周宣布的），造成危机的形势，周势必要向毛报告。

（二）毛狼狈离开武汉，很不高兴。毛是坐普通的轿车离开武汉的。毛在解放后不愿意坐飞机，这次不得不坐飞机到上海。毛有受制于人的感觉。

（三）毛当时认为，军区和人武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和“群众专政”。江青的“文攻武卫”由此而来。

毛弄清了陈再道没有害他之心，所以放过了陈。

王力的问题涉及全面，毛不能不抓一抓。

“武装左派”等，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毛用“润之”的名字给江青写了一信。这个信，我处有一个复印件。

2005年11月20日致舒云——

在1966年或1967年，江青在红卫兵中掀起一场大讨论：批50天还是批17年（见《红卫兵讲话集》），“批17年”，令人触目惊心。

王力记下了毛在1966年12月26日（毛的生日）那一天毛对王力等人说的私房话（林、周、刘、邓均不在场），要旨是：“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要以新代旧。王力也记下了毛的“剥笋”的指示。

毛老了，他想后事了。

毛在1966年12月26日的讲话中说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现在才有的，建国后就开始了。报上公布过这一条语录。毛要算旧账。毛是一个记仇的人，死不认错而刚愎自用的人。毛要以文革这一“俊”遮百丑。

刘对毛讲过：“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给毛以很大刺激。（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开始考虑将来历史书上怎么写他了。他是对此很计较的人。他先发制人，率先否定17年。又表示他的高明。

我以为，毛要通过文革，把他17年中领导的错误统统推给刘少奇，让他当替罪羊，一如他要把文革的错误推给林彪，让林当替罪羊。

刘、邓50天的错误，是毛设下的陷阱。他放手让年轻人造反，又在之后工作组问题上含糊糊，诱使刘、邓上当。刘去南方请毛回来，毛也不回来。毛以别人犯错误为乐，又喜欢别人检讨，毛是一位奸雄，心理阴暗得很。他不讳言他是秦始皇、曹操。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议出《刘少奇传》，就有坏心了，要把刘放在火上烤。不料，刘并未忘乎所以，很谨慎。毛计落空。王光美出国，江青要她如何打扮，存心要害王光美。刘的一家和睦，也为毛、江不容。

毛的“走资本主义路线”、“走资派”，都是他的害人的工具。连胡乔木都讲过，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人为的阶级斗争”。任意给别人戴各种帽子，是毛的习惯，是从延安带下来的习惯。

毛要通过“文革”，清算建国后反对过他的人，全盘肯定他自己，为自己树立纪念碑。

江青迫害刘少奇，从根本上说，是毛造成了形势和条件。

.....

“九大”不宣布文革结束，因为还有重要的事没有做完。“九大”以后，两报一刊经常出现大块文章，论点遍及各条战线（农业、工业、新闻、轻工业等等）上的“两条路线斗争”，重塑历史，都是“大批判组”写的，写了也不负责任。

军队在文革中坐大，（三支两军、革委会、军委办事组、军代表）本是毛一手造成的，毛又不放心，因而设计整林，林不服，出走，林以他的死粉碎了文革，打击了毛。

.....

我的零碎的思想片断：

毛十二万分地重视文革。有三事可证：（一）毛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的文末加了一大段，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开头，印出时用了黑体字。这段话中有“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一语。这是讲文革的评价，无法再高。（二）《王力反思录》中记载：1966年8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对王力等人说：“文化革命要搞到底，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毛以生命作赌注了！（三）众所周知，毛讲过一生办了两件大事，文革即其中之一。毛以他的绝对权威，表明了文革的极端重要性，要人们拥护。

毛一反自己的“区分西安和延安”的思想，从1963年起，不断否定中国建国后十七年的成就，在文艺、体育、工农业生产，干部队伍、中央状况等方面都有否定乃至全盘否定的言论，共和国的缔造者贬损共和国的成就，岂不怪异？不知你要怎么写。对你的大作，我以先睹为快。

2005年11月22日致舒云——

我回忆中文革时期的许多“大批判组”写的文章，都是以“批判”的名义实际上重写历史。一切功劳归于毛，一切过错归于刘。这些文章，不少还要再看看。这些文章，好像是康生、陈伯达在1967年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定的调子。

在文革中，刘少奇必死无疑，他不会有更好的命运。死得那么惨，因为他是“修正主义”头子。

在文革前夕，是不是毛没有权了？似乎不是，至少还有军权，他还可以指示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还亲自主持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毛是说假话不脸红的人。

我（党）与苏联十年论战失败，促使毛另生一计，他要以创立新社会的极其辉煌的成就来掩盖过去的一切错误，他要使世人信服他。

毛确定想当世界革命的导师。在中国，他要“君师合一”。林彪在公开讲话中说过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毛的失误，在于他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世界潮流。

毛对三面红旗的失败是不认账的，不服气的，他要以实际行动为三面红旗平反。整吴晗、整“三家村”，都是具体表现。《王力反思录》中有一节：《文革的理论与公社的理论是一致的》。

毛在文革中故意使用一些含混的概念，如“新”、“旧”，以迷人眼目。

胡乔木说过，革命者总是想革命早点成功。以为毛的急功近利解脱。毛的问题不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而是南辕北辙。

毛以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过去的一切错误。他要算一个总账，否定一切反对过他的人（刘、邓、彭、周、陈云、薄一波），所以他不惜倾家荡产，不惜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泊。有大利益在焉。

毛的目的不能公开，所以文革中充满隐秘。毛必须得用江青，他可以容忍江青玩弄面首。

周在弥留时与邓颖超相对无语，因为他知道很多实情，不能讲，也不能对夫人讲。周为何痛哭？因为他痛恨自己，愧对民心，对共产主义事业也失望了。

2005年12月22日致阎长贵——

“九大”政治报告是一个重要文献，它对毛的一切都作了肯定。此报告经毛多次修改。

林彪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由陈伯达写定，经毛审阅，集中地反映了毛当时的想法。这是“打倒一切”的讲话，而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把“打倒一切”扣给了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

有人问李锐：“政治是什么？”李答：“是不要脸。”信然。

2005年12月24日致舒云——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从七千人大会就开始了，此说能够成立。江青在文革中说：七千人大会的这口鸟气今天才吐出来。她是代毛讲话了。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少数，这话毛自己讲过（1967年2月上旬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讲的）。林对打倒刘有自己的看法。林518讲话，并无原则错误，……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其间还发生了一些事，如刘少奇说过：过去的调查研究方法不行了，不蹲点不能当中央委员。这些话都给江青抓住了，认为毛还未死，已经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曾给江渭清一信，隐含贬斥毛的思想之意，也使毛老大不高兴。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毛又直接发生了矛盾。对于文化战线，毛、邓的看法又不同。彭真在1966年初文化厅长大会上暗刺毛（这次大会我参加了，亲自听到彭说：毛说他多少年没有抓文化了。他要负责，要我向大会传达，好，我传达了。）

……

请你注意多看看，毛审定与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和毛多次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这两件中大有文章。我正在读与此二件有关的档案材料。

邓拓自杀的根本原因，是毛讲了“邓拓是叛徒”，这话由康生向书记处说了，又向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

毛念念不忘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反击，抓批《海瑞罢官》，抓批“三家村”，都与此有关。

“九大”政治报告，肯定了毛的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斗、批、改”的意图从中也可以看出来。

2006年1月15日致陈小雅——

多少年来，我有一个认识，陈伯达一案乃系冤案，一个大冤案。一些有识之士与我同感。一些老党史工作者摇头慨叹。香港出版了《陈伯达遗稿》，《遗稿》还不能说明多少问题。接着，香港又出版了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这本书大大地为陈伯达翻了案，它逐一地批驳了强加给陈伯达的几顶政治帽子。陈伯达虽然人品不好，但一生忠厚，辛勤治学，也有不小的成就。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算一个人物。他当过文革小组组长，其实文革小组内长期由江青专权，陈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毛说没有与陈合作过，也太过分了。

2006年4月26日致吴迪——

舒云女士写了《林彪画传》极好，我为她写了序。此书有重大突破。如认为倒罗是毛的主意。她的论述有理而有力。在倒罗事件中，叶剑英跑前跑后，又主持了在北京批罗的会议，向中央写了批罗的报告，足证叶是批罗的主角，足证这是毛的决策。连罗点点也被骗了。毛的手腕高明之至。此书还有许多优点。我读它们几次落泪。外面有个传说：黄永胜在秦城监狱，食无酒而大发脾气，层层汇报上去，毛说：今后饭加酒，黄永胜有此资格。可见毛对黄等的战情是十分清楚的。舒云为林立传，一大贡献也。我写的序，舒云认可了。我不知此书在何处出版。

2006年5月9日致吴迪——

有关部门找过我的麻烦，所以我不同意《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我和朋友合作的文章。详情以后向您陈述。我可能早已上了“黑名单”。我不得不把“平安无事”放在第一位。我的党龄已

有五十几年（1950年入党），至今不为我党所信任，其中痛苦，难以言表。《当代中国研究》说我与朋友合作的一文可以发表，我不得不咬牙加以拒绝。文人自己枪毙自己的作品，会是什么心情？朱厚泽（朱泽厚？）呼吁“阳光政治”深得我心。毛老头子有名言：“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无非霸王别姬！”可是不让人讲话的祖宗，正是毛本人！欧洲一著名主编请教恩格斯，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概述《共产党宣言》的主题思想，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是：“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大意如此）呜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共堕落到何种程度！

2006年6月15日致阎长贵——

吴迪兄寄来的“研讨会记录”（郝建整理）。使我大吃一惊。几位先生反映：中国民间正在兴起一股肯定文革之风。这与中国民间对官僚阶层的不满密切有关。我也正在注视这个思潮。几位先生谈到了，想必是有根据的。这当然与官方的态度更为有关。由淡化文革而肯定文革，也不过一步之遥

□ 摘自《记忆》第一期

~~~~~

### 【见证历史】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与江青打交道

• 王广宇 •

（编注：作者1966年6月调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1967年1—8月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

1966年夏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新的一轮阶级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阴差阳错地被卷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一名办事员。

我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1967年初，我被中央文革小组个别成员封成“办事组长”，既无任命文件又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由于我无权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错为最大幸事。

考虑到我这个负责人工作的困难，戚本禹被指定主管办事组，由他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事情直接向他请示报告。他怎样布置工作，我们就怎样去执行。我们都把他当成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工作人员发号施令的人。这一点在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怀疑。通过我的耳闻目睹，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最受江青信赖，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有来头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对执行小组的决定都很坚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们这些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会有什么“路线问题”。我们都自认为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员中工作越多，任务完成得越好，下场越惨。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值班室的七个人，其中五个人——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入监狱，两个人——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文艺组、宣传

组、理论组、档案组、记者站、办信组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何罪之有？他们整天在中央文革领导的眼皮底下，俯首贴耳地、胆战心惊地为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服务。可是，首长一翻脸就把这些人先后一个个投进了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

说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有权威最可信赖的代名词，因为它是冠以“以毛主席为首”这个特称的，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誓不两立，针锋相对的概念。能够沾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边的人，一律都是“革命左派”，挂不上的就是“保守派”。这种划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各派红卫兵捞取政治资本的标准。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小组。

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组长”，她从来就没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内部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她动辄就训人，就要横，小组成员中不论老的少的都得让她三分。至于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她眼里只不过是奴才，对工作人员训斥是家常便饭，只要她不高兴了就拿工作人员撒气。我对这位领导的态度是“畏而远之”，只要她不点名叫我，我绝不同她打交道，能躲就躲。有时实在躲不开，叫她碰上了，见了我就先批评，然后再说事。下面我把印象最深的、同江青直接打交道的几件事说给大家听。

#### ◇ 服装问题

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办公室刚从钓鱼台十一楼搬到十六楼没几天，戚本禹从南海打电话给办公室，让我们通知服务员赶快把大客厅的室温调好，说江青马上来十六楼开会。戚本禹交代，让办公室的几个人和管理员作好准备，迎候江青同志的到来。这是江青文革开始后从上海回来第一次来钓鱼台。

我从未见过江青，也想见见，加上工作关系，又出于礼貌，我和矫玉山在十六楼门厅迎候这位“第一副组长”。不一会儿，中央办公厅九局二处的警卫人员先步入大厅，随后，江青在戚本禹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江青穿了一身黄呢子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脚登一双黑皮马靴，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紧随其后的是警卫员孙立志，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小张等一千人马。这些人一律穿着崭新的军装。我和矫玉山站在门厅旁恭候。戚本禹陪江青走近我时，向江青介绍我说：“这是王广宇！”江青用戴着黑框眼镜的眼睛打量我一下，脱口而出一句：“怎么！是穿黑衣服的？”其实我穿的是藏蓝色卡叽布中山装，不是黑色。戚本禹对这句话没有理会和解释，江青就匆匆地走向大客厅。这是我同江青首次见面，她甩给我的第一句话。

江青嫌我穿黑衣服，说明我们的穿着使她看不惯，为了适应她的需要，我们向戚本禹反映，让工作人员一律换成军装。戚本禹原以为工作人员换军装不是大问题，没有反对。可中央文革小组开完会，戚本禹回值班室却说，“江青同志不同意都换成军装。”我们向戚本禹力争：“你们小组成员都穿上了军装，首长的秘书、警卫、随员也都穿军装，而我们工作人员整天为你们服务，同你们一起出去开会，我们穿蓝衣服，同中央文革的穿戴不配套。”

实际上，江青那时对中央和地方干部早存戒心，她用穿军装来表明对军队的信赖。当时，绿军装成为革命的象征，穿军装就意味着是“左派”，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所以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以后，穿绿军装成为一种时尚，红卫兵们千方百计地到处找旧军装。

在工作人员的强烈要求下，戚本禹答应可以从总政领一部分军装，作为外出工作服，谁跟小组成员出去就换上军装。办公室从总政领来大、中、小号军装共十几套，作为公用服装，不



固定给个人。这样，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主要工作人员才算有条件地穿上了军装。

#### ◇ 电话问题

江青刚刚从上海回来时，到十六楼开会有时候路过值班室还进来看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在大客厅开会，还到值班室的红机子上接打电话，值班室固定的三、五个工作人员她也熟了，对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还不太防备。由于首长的随员秘书、护士、警卫要随时伺候，他们不能离会议室（大客厅）太远，而十六楼又没有空房给首长的随员做休息室，这些随员们也都集中在值班室准备随时听使唤。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陆续增加，江青发现生面孔的人多了，有的她不认识。有一次，江青来值班室接电话，发现值班室人多，乱哄哄的，勾起了她的无名火，她大声斥责：“我打电话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都出去！以后我来打电话时，不需要你们在场！”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和随员们一个个乖乖地退出值班室。从此，便形成了一个制度，只要江青到值班室来打电话，工作中人不管手头忙什么，一律放下手中工作退出值班室回避。

十六楼值班室是小组成员去大客厅开会必经之处，值班室的门总是开着，一是便于小组成员交代事情，二则什么人经过门口去会议室可以有个关照。1966年秋天以前，办公室的三个组（文电组、简报组和调查组）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十六楼一层，人多房少，办公室都兼作卧室。办公室的值班室设两部红电话机，两部普通电话机，上、下、左、右，红卫兵的电话不断，都要人接。值班室又要为会议准备文件和开会需要的材料，有重要事情要随时向小组成员报告，小组成员也不时来办公室交代办各种事或发通知，值班人员要处理的事务不胜其烦，因此值班室给人感觉太乱。有一次江青又来值班室，看见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接下边红卫兵头头打来的电话，好像是请示什么事，在一旁的矫玉山向江青报告，自从中央文革电话向社会公开后，红卫兵来电话问各种问题不断，我们都无法答复。江青听后马上说：“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对下边来的电话和请示报告，一律不准擅自答复和表态，只能向小组反映请示和报告。”

从此，凡是中央文革办公室收到的请示报告，接的电话，都要做成电话记录，重要的随时送小组成员批示。一般的来电话都以“向上反映”来处理。江青的这条“指示”，成为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制度。

由于办公用房太少，电话多，互相干扰，办公室在十六楼的小客厅（紧挨大客厅）安装了一部长途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手拿耳机一手作记录，时间长了实在吃不消。我们请中央办公厅电话总机的技师帮助，在电话机上安装一个扩音器和麦克风，使接电话的人免受手拿耳机之苦，腾出手专做电话记录。安装没几天，突然有一天开会中间，江青找人谈话进了小客厅，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因大客厅开会，停止了接电话。江青谈完话，突然发现了在小桌上放着电话，扩音器、麦克风，她大吵大嚷地回大客厅指责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偷听她的谈话。正在开会的小组成员都出来到小客厅看“窃听器”，质问我和矫玉山为什么安“窃听器”。小组成员还当场作试验，看能不能窃听。我和矫玉山再三解释，安的不是窃听器，是电话的扩音器，是接长途电话用的。他们查了半天，无法窃听，这才作罢。

#### ◇ 江青第一次说我“不精神”

1966年10月，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清算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在大小会上作记录，晚上回来整理记录写简报。这个会虽然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但原中央书记处已经无法主持工作了。由尚未被打倒的大区书记主持小组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系统由几个副总理和元帅主持会，设立了简报组，主要是组织大小会记录，编发会议的简报，多数是发言稿的摘登，发给全体与会人员。而列席这个会的中央文

革小组成员，分别编入各组，他们则另外组织一套班子，由中央文革派几个人作记录，自己编另外的会议简报，这份简报只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几个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成员。这套简报的特点是短小、简练、不登已整理好的书面发言，重点放在会议参加者的即兴发言和会上的各种插话上，即所谓“拾遗补阙”。

在这次会上，最后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讲话，林彪也讲了话，会议的主报告是陈伯达作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月的总结。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刘、邓也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在会上还对刘、邓说，“谁要打倒你们？我才不要打倒你们，有错误检讨就是了。”（大意）直到1966年10月末，刘、邓的问题还只是在党内高层中批判的。我也感到刘、邓还是党内问题。

在最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中央文革派杨子才、阎长贵和我在大会上作记录。大概是会议开完后的两天，我刚刚整理好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突然发起40多度的高烧，已经烧糊涂了。办公室的同志把我送进301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扁桃腺发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一个有三十多个床位的外科大病房，床挨床，经打针吃药，住了大约不到一周后出院。说心里话，我是太累了，真想趁机回家休息几天，可是主管我们的小组成员不同意我回家休息，让我在钓鱼台休息。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下我能休息吗？实际上还是拖个疲惫的身子继续为他们卖命罢了。

医生嘱咐我，出院后继续休息一段，吃流食。遵医嘱，我只好一天三顿吃挂面汤。有一天中午，工作人员已经开过午饭，我到小食堂去吃病号饭。服务员刚刚给我端上一碗热汤面。突然江青在戚本禹陪同下进了小食堂，要吃午饭，他们进来，我猝不及防，便赶紧大口吞面，想赶快离开小食堂。没想到江青凑到我桌前坐下来，端详我狼吞虎咽的狼狈状。然后说：“不着急，慢慢吃！”接着说，“我怎看你总像睡不醒似的，年轻轻的，这样没精神。”我无法解释，因为我的确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时，戚本禹过来帮我打了圆场，戚本禹说：“他生病了刚刚出院，还没恢复过来。”江青缓和下来询问我是什么病住院，我告诉她是扁桃腺发炎，发高烧。江青一听，话就来了，她对我说，解放初期她也害过扁桃腺发炎，也常发烧，后来医生给她作了扁桃体摘除手术后，就好了，再也没发过炎。她建议我把扁桃体摘掉，我唯唯称诺。聊了一会，她们要开饭了，我趁机告退，这是江青第一次说我“不精神”。

#### ◇ 办公室改办事组

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的十六楼，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贴了一张小字报，不仅在办公室工作人员引发了一次波澜，也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肖力批评办公室工作“杂乱无章”，“不得要领”，无法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江青等小组领导也觉得办公室的工作不得力。他们认为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的领导，无法集中精力管好办公室，于是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律不再兼任办公室的领导工作。

不久，从解放军报社调来记者部主任宋琼改组办公室。大约是1966年年底，宋琼提出了改组办公室的工作方案，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首先，将中央文革办公室改名为中央文革办事组，这是文革期间全国第一个使用“办事组”的名称。其次，加强办事组的集体领导，组成了以宋琼为组长，陈满池为副组长的办事组，这个组的成员共五名，除正副组长外，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办事组集体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管理整个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过去重要情况随时一事一报，小组领导嫌麻烦、琐碎。办事组成立后创办了《要事汇报》，把每天重要的情况及时打印出来分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及小组成员和个别列席小组会的人。《要事汇报》不定期，有时一天一期或几期，有紧急、重要情况随时上报。此外，还加强了对记者站的领导，把原来由解放军报记者组编辑的、以中央文革办公室名义出刊的《快

报》同记者站合并，由记者站统一编辑出版《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宋琼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每次会前，宋琼要把每日要事，需要提交小组讨论的文件先向陈伯达、江青口头汇报，由陈伯达、江青决定小组会的内容和参加人。这套会前汇报形成了制度。

宋琼主持办事组工作，大约有一个多月，就被以肖力为首的解放军报社造反派抓回解放军报批斗，办事组两位原解放军报社的成员杨子才和张文荣也同时被揪走。这样，办事组的五个成员中，解放军报社调来的三位被打倒，办事组副组长陈满池在记者站工作，未到任。原来的办事组成员只剩下我一个人。戚本禹在宋琼等被揪回解放军报社后，对我和矫玉山说，要我们两个把办事组的工作抓起来，并口头封了我俩为办事组正副组长，但是我俩不能列席小组会。

#### ◇ 江青第二次批评我“不精神”

王力、戚本禹在宋琼离开办事组后，一再向我和矫玉山交代，办事组日常工作不能间断、停顿，一切工作照常运作。“萧规曹随”，开始两天，在开小组会前，我遵循宋琼的工作程序把当天重大情况打成《要事汇报》，和需要小组领导审阅的文件都夹到卷宗里，送到大客厅会议室，然后把卷宗放在陈伯达、江青的座位的桌子上，就赶快离开会场，他俩也没让我口头汇报。

大约是第三次，小组开会前，这次陈伯达、江青破例提前来到会议室，其他小组成员还没到，我又拿着卷宗进去，江青见我后，让我坐下谈谈今天有什么重要事情，我按《要事汇报》的内容复述了一遍，江青似乎没有认真听我的汇报，又端详我一阵子后开口说：“我一见到你就想批评你，怎么年轻轻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总像没睡醒似的？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做好工作？”我无言以对，只好愧疚地低下头接受批评。这时陈伯达的问话把话岔开了。陈伯达问江青：“他（指我）是办事组长吗？”江青向陈伯达摇摇头，没说话。我看开会的小组成员陆续到场，便向他俩告退了。这是江青第二次批评我“不精神”。

我受江青的窝囊气实在感到太冤。难道“不精神”也是罪过吗？再说我每夜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甚至连轴转为小组服务，我能打起精神吗？这次被江青批评后，我找到了戚本禹，请他换人，我没条件和能力同首长打交道，但我也不能明说江青看不上我。戚本禹说：这样吧！以后由我同小组领导联系，你们有重要情况汇报请示先同我讲，我到会上说。后来，戚本禹又对我说，以后办事组的事由他来管。戚本禹主管办事组，对我是一种解脱。

#### ◇ 我又无端挨批评

此后，我更加小心谨慎，尽量不见江青的面，怕她看到我惹她生气。有时小组在大客厅开会，需要向小组领导送文件的事，我都让矫玉山或李奎林去送。我只愿意做点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不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打交道是不可能的，除江青外，其他小组领导和小组成员，关注的是工作，同工作人员接触还是平等的，而唯独江青那么在乎工作人员的外在形象。

1967年的夏天，一个上午，有一次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场集合了十几万人，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文革小组不到会，他们就不开会，也不散会。大会指挥部，连续几次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催促小组成员快去参加会，那时已经10点多钟，学生已坐等两个小时了。

王力来到办事组后，我向他汇报学生等小组成员参加会的情况。王力也有些着急，他对我说：“你亲自去请示江青同志，叫她定谁去参加会。学生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不去不好。”王力又强调：“你是办事组长，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去向江青同志请示，其他同志都不能定。”

我有苦难言，就怕同江青见面，而王力逼我去找江青，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江青，心想尽量把话说得明确简短些，以免影响首长。我马上去十一楼，先找到江青警卫员孙占龙，请他向首长报告，说有要事请示。孙占龙进江青的办公室看了一下，回来告诉我首长刚起床。叫我在会客厅等一下。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大约等了十多分钟，孙占龙告诉我首长来了。我站起来向江青汇报，红卫兵在体育场开会等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由于我过分紧张，说话的声音可能都变调了。江青突然大发雷霆，说：“你看你这副样子！我看你这个样子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阎长贵也有这个毛病，这都是个人主义作祟……”

正在江青大吵大嚷的关头，戚本禹进来了。江青又冲戚本禹发火：“戚本禹，你以后不准往我这里带生人。你知道我怕见生人嘛，今后办事组有事你直接同我联系，不要叫外人来。”戚本禹向江青劝解说：“好！以后我同你直接联系就是了。”这时炊事员来给江青送早餐，戚本禹趁机对我说：“你回去吧！我同江青同志商量去参加会的事。”

我灰溜溜地退出了江青的会客室。回办事组值班室我向矫玉山和李奎林述说了我去请示江青的遭遇，并转告他俩以后不要直接去找江青，只能通过戚本禹去请示她。王力叫我去找江青请示工作，我有何辜，无端受了一通批评。

#### ◇ 我同江青打交道中唯一没挨批的一次

在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两派斗争中，江青、陈伯达是支持聂元梓的。聂元梓得到江青的青睐，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譬如聂元梓想到钓鱼台来就来，开始在多数情况下她都受到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待。1967年4、5月，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会开完会后，已经是12点以后了，江青仍在十六楼大客厅单独同聂元梓密谈。大约凌晨两点钟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到值班室通知我说：“江青同志让你去大客厅有事！”我立即到大客厅见江青，看到江青和聂元梓还在谈什么，当我站在江青面前时，江青抬起头打量我一下说：“你马上去北大，取一件东西，快去快来，我们在这里等你拿回来，你要亲自去！”这时，聂元梓接茬说：“你到北大××斋×号，去找一位叫×××的女同志，叫她把我设计的一张复课闹革命的图取来。”因为那位女同志不认识我，我让聂元梓写个便条，聂元梓写好便条后说，“你就说我要那个图，一说她就知道了。”

我遵命立即赴北大，找到那位女同志，取回了一张图，回钓鱼台交给了江青。由于是夜间行车，交通顺畅，我又一点不敢耽搁，来回不到半小时。当北大的那位女同志交给我一张十六开纸的图时，我翻看了一眼，只不过是一张写有各系的名称和复课时间的图表，完全可以向江青口头汇报，可聂元梓故弄玄虚，骗江青，好像珍藏了贵重的“联络图”。这是我同江青打交道中，唯一没挨批的一次。

#### ◇ 中央文革开会不作会议记录

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到1967年后，周恩来总理是固定要参加的，后来亲自主持会。当时中央常委中能代表党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只有周恩来一人，他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后来通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小组会上作了决定，需要发文件的都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这四家的名义发出。可见中央文革已经变成了政治实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从来不让作记录，这样的决策机构在会上每个人的发言和做出决议都没有记载。以往文件绝大多数是王力根据会议的议论和决定凭记忆起草，然后送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人批发。这种状况的形成和陈伯达、江青的政治需要有关，陈伯达、江青在会上往往是信口开河，说话毫无准头，如果给他们记录在案，以后出了错，他们就无法赖账，不记录，他们就可以不负责

任地胡说八道，出了错，一推六二五，空口无凭，抓不着他们的辫子。因此，江青、陈伯达都是“一贯正确”的。

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不记录这种不正常状况，周恩来早就感觉到了，他主持碰头会后，提出碰头会要作记录。有一天，周总理来到办事组值班室对矫玉山等人说，今后碰头会要作记录，记录人由总理值班室出一人，办事组出一人，两人参加会议作记录。第一次由总理值班室的周家鼎和办事组的矫玉山二人参加了碰头会作记录，不知何故，江青竟然没有反应，他俩平安无事地完成了首次记录任务。由于周总理布置碰头会要作记录那天我不在值班室，矫玉山向我传达了以后碰头会要作记录的指示，要我第二天去会上作记录。

为了慎重，开会前，我报告戚本禹，周总理让办事组和总理值班室到会上作记录。戚本禹不假思索地说：“那你就去吧！”

说也巧，那天晚上碰头会前周总理去毛主席那里谈事情，总理值班秘书还没来钓鱼台，我怕耽误事，就提前准备好纸笔先到了会场，坐在会议桌后边沙发上准备伏在茶几上作记录。这时参加碰头会的人已经到齐，专等总理来开会。不一会儿，周总理匆匆赶到会场，他坐定后刚说了两句话，“我去主席那里，主席讲，兰州军区的×××过去历史上是有过战功的……”

这时，江青突然发现我在作记录，她打断了周总理的讲话，阴阳怪气地说：“我们这个会需要作记录吗？”然后看着我问：“是谁叫你来的？”还没等我回答，列席会议的叶群赶快声明：“不是我叫来的！”

会场鸭雀无声，气氛异常紧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说话了：“是这样的，我说过碰头会上要记录的，不过今天这个会的内容可以不做记录！”我趁机退出了会场。

上边几件事，是我同江青直接打交道时所遇到的难堪。江青看不上我这倒是小事，但她这种蛮横无理的霸道作风实在令正常人难以容忍。而我这个忠顺的“驯服工具”都忍耐下来了。

#### ◇ 江青指示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薄一波等人的大会。当王光美被押着出场时，她套着紧箍着身子的旗袍，头顶戴着一顶洋草帽，脖颈挂着一串乒乓球制作的“项链”，这身打扮很不合时宜，当时还是春天，却身着夏装。显然，这是对王光美的丑化和污辱。

这个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穿戴是江青亲手制造的。笔者作为见证人，把这场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和污辱的内幕告诉国人。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行前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十一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十六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转脸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记录片。同时，在批斗

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

-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污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回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的现场记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辞，隐去了他布置的环节，但他实际上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人。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

## 【往事追忆】

北航批斗彭德怀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批斗彭德怀问题，是北航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等人犯的主要错误之一。笔者认为，假如文革中没有批斗彭德怀这件事，韩爱晶等人的错误可能要小得多，起码不至于被判15年重刑。

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个单位的老干部没有挨过批斗，也没有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没有批斗过老干部。包括刘少奇、贺龙等老革命家也被整死了，至于被老红卫兵、“联动”分子毒打、迫害致死的冤魂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大小小的打手们理应当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但历史的事实是，批斗彭德怀与批斗别的老干部就是不一样，因为他叫彭德怀。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太值得人们同情。因此，主要是由于批斗过彭德怀，韩爱晶被判刑15年，王大宾被判刑八年。而那些滥杀无辜的老红卫兵和参与迫害刘少奇、贺龙等人的人不知道判了多少年。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韩爱晶实在是个复杂和矛盾的人物。

对于彭德怀本人，据我所知，北航红旗头头和群众中不少人对他是同情的。1967年夏天，有一次头头们在一起议论彭德怀，我也在场。头头们都认为彭德怀功劳很大，庐山会议上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意见惹了祸，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彭德怀已无权无势，又没搞什么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与彭德怀本人没有关系；吴晗写“海瑞罢官”也不可能是彭德怀指使的；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批判他没有多大意思。（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当年吴晗写“海瑞罢官”很可能就是要为彭德怀同志抱不平，只不过当时不敢承认罢了。）

记得当时韩爱晶说：“你们怎么看彭德怀？我觉的他挺冤枉的。他功大如山，心直口快，坏事就坏在嘴上。彭德怀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总理厉害。我看主席对彭德怀是恨铁不成钢。主席这个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的。这也难怪，谁当官都愿意用奴才，整天给你提意见，你高兴吗？中国的一把手历来独裁。中国的事情，最后总要一个人说了算，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韩信功劳不大吗？不照样被刘邦杀了吗？现在谁还骂刘邦？”大家一致让韩爱晶住嘴。

不久，韩爱晶可能忘了他同情彭德怀的话，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彭德怀。

还有一次，北航红旗内部有两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反林彪的秘密组织“国际红卫军”，牵扯到革委会常委田东。此事非同小可，传出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例行公事，开革委会批评田东。田东很老实，如实地把对林彪的看法、怀疑说了出来，认为林彪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大家一致批评田东，韩爱晶当时没有吭气。

谁知后来韩爱晶对我们说：“我看田东的话有道理，中央的事难说。你们认为中央净好人？陈伯达被江青逼得要自杀，你们知道吗？”

1966年底的一天，韩爱晶接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电话，通话内容大致如下：

“韩爱晶同志，现在有一个人过得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把他揪出来！”

“谁？”韩爱晶问。

“就是那个‘海瑞’彭德怀嘛！”戚本禹神秘地说。

“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揪他有什么意思？”



“彭德怀现在很不老实，闹翻案，不能让他太舒服了。”

“中央知道了批评我们怎么办？”说实话，韩爱晶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红卫兵小将嘛！这样婆婆妈妈还行？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吗？”

“那好吧，彭德怀现在哪儿？”

“在成都。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你们可以通过四川省委的‘黑帮’打听一下。”

于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派了几个精干的学生，赶到了成都，在当地红卫兵的协助下，到永兴巷7号抓到了彭德怀。不料在去机场的路上，遇到了王大宾的“地院东方红”的大队人马，因寡不敌众，彭德怀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了。彭德怀被押到北京后，先被拉到地质学院关了起来，后来周总理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彭德怀送到西郊什坊院的军营里“监护”了起来。

1967年7月中旬，北航奉命批斗彭德怀。

奉谁的命？不光是奉中央文革的命。历史的事实是，批彭问题，作为中央文革总召集人的周总理也是点了头的，或者说“迫于无奈，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但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

北航要批斗彭德怀，革委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过，决定先小范围审问，再组织大会批斗，会议的组织工作由五系革委会负责。这种事属于“斗、批、改”大事，由常委们亲自抓，不归我管，所以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和找我商量过。

我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在北航主楼二楼，紧靠楼梯，里外套间。由于里面有临时档案和武器，一般人不准进里间。平时，个别常委常在我的办公室找人谈话。

下面的事是1967年7月19日发生在我办公室里的历史事实。

这天一早，我在办公室里刚起“床”（文革中我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一会儿卫戍区要把彭德怀送来，韩爱晶说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再去会场。过了一会儿，两个学生把彭德怀带进了我的办公室，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女同学。

我让彭德怀在我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给他倒了杯水。彭德怀看了我一眼，说了声：“谢谢！”

我端详着彭德怀，在此之前我从来见过他本人，只见他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光头，脸上有不少刀刻般的皱纹。他一脸阴沉，毫无表情。令我吃惊的是，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无领囚衣。这就是说，他在卫戍区是以犯人身份被“监护”的。

凭我的胆量和身份，我忍不住开了口。我没法称呼他，又不愿直呼他的名字，便说：“您身体还好吧？”

我实在记不清彭德怀是怎样回答的了，是“还好，谢谢。”还是“老了，一身病。”记不清了，但他点头对我表示了感谢。

我又问了一句：“知道是谁让我们批判你的吗？”

彭德怀看着我，说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们不懂。”就不讲话了。

我没有再问敏感的问题。说心里话，我当时只知道彭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提过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国防部长的官，但还是共产党人，只不过犯了错误而已。我心里确实对他十分同情，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我敢说，如果让我负责批斗彭德怀，我当然也要执行，但他决不会挨一下打。所谓批判，不过喊喊口号，念念稿子，例行公事而已。我这人心太软，活到今天，除了揍过儿子的屁股外，从未打过任何人，包括小偷流氓。

这时来人通知送彭德怀去会场，彭被押走了。我没什么事，便锁上门，跟在后面向六系楼走去。我想去会场看看，虽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但出于好奇，去看看还是可以的。学校里认识我的人很多。从主楼到六系楼很远，路上有许多学生围观，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我跟在后面的缘故。

这次小型批斗会（韩爱晶叫预审会）在北航六系楼一间教室里进行，由韩爱晶和王恒（北航原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审，有关头头们和五系许多学生参加，但我赶到的时候，已挤不进去了。我便站在门口，踮起脚观看。这时，有人开始喊：“打倒彭德怀！”记不清是韩爱晶还是别人开始审问。

“彭德怀，你为什么反毛主席？”

“我没有反毛主席。”彭德怀说。

“那你说的无产阶级狂热病，指的是谁？”这时，一些人高喊：“彭德怀老实交待！打倒彭德怀！”

我刚听到这里，后面有人扯我的衣服。我一回头，组织部的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你哥哥从山东来了，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迅速离开了会场，后边的事我就知道了。

我回到了办公室，一看是维坦六哥从老家来了。他是五哥戴维玉烈士的亲弟弟，在家当小学校长。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学校正在批斗彭德怀……

六哥一听，瞪大了眼睛，大吃一惊地对我说：“什么？彭德怀？彭德怀你们也敢斗？我跟你讲，维坦，这事你少干！家里人听说你在北京造反，祖母和四叔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你知道咱家里闹成什么样子了吗？”六哥越说越有气。我忙让六哥喝水，向他简单解释了有关情况。

六哥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文革以来，家乡也闹得厉害。县委书记被批斗死了，村里也成立了所谓造反派组织，专斗村干部，当支书的四叔被打成走资派，天天挨批斗，差点被打死，已经到济南躲起来了，六哥本人也挨了斗。最可气的是，批斗四叔时，我老祖母上去保护，被“造反派”们推下台去，摔破了头。我老祖母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老烈属，无人敢动老人家一根毫毛！我听到这些，顿时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赶回家去，杀了那些王八蛋，解救亲人们。

六哥的来京，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开始反思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虽然我文革中有极左思想，但行动上往往偏右。对造反派我一直主张一分为二，有好有一坏；对老干部我认为可以批判，但不能随便打倒，更不能武斗打人；在大连我甚至支保拥军镇压了“造反派”。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拥护，是理论上的铁杆造反派。我虽然没有参与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但也没有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过多少老干部（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总认为，我们是按毛主席的号召造反的，中央是支持我们的，不造反当保守派岂对不起毛主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崇拜万分强烈，用当时的话说，真是“高过喜马拉雅山，深

过太平洋”。我左右为难，思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任何情况下，决不参与批斗老干部。

六哥在北京住了几天，惦记着家里的事情，先回去了。他让我也尽快回老家一趟。

后来我才听说，在7月19日的北航批斗会上，有人打了彭德怀，韩爱晶也用拳头捅了彭德怀一下，主要是别的学生打的。后来的许多文革书籍几乎全部写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一个卫戍区小战士的话，说彭德怀被打的很厉害，连肋骨也被打断了，头也打出了血……不管小战士的话有没有水分，但彭德怀被韩爱晶和北航学生打了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某些人犯的重大错误和罪行。笔者认为，后来韩爱晶被判15年刑，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

本书不想为韩爱晶辩护什么，作为20多岁的青年学生，韩爱晶已不是小孩子，打人不对，打彭德怀更不对。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晚了。文革中无法无天，批斗会上打人是家常便饭。北航红旗中确有几个学生爱打人，这是我们队伍中的败类，我曾经处理过他们，但当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北航红旗，以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的失职。但话又说回来，当年的中学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不知打死打伤了多少“黑五类”和“黑帮”，但他们没有打彭德怀，所以也没有人被追究并判刑。当时中央让批斗彭德怀，彭老总被中央（绝不单是“四人帮”之流）说成是反毛主席的大反革命，大“黑帮”。年轻无知的学生们把彭老总当成了坏人，动手打了他老人家。作为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亲自动手打人，这点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韩爱晶等人因此遗恨终生。

可怜的彭老总祸不单行。“719”预审会后没几天，经中央批准，北航和地质学院于7月26日在北航南操场又召开数万人的大会正式批斗彭德怀。万幸的是，上天保佑我，7月25日下午，我不知哪根神经作怪，突然决定非回山东老家看看不可。韩爱晶等人不同意我请假，说明天要在南操场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黑帮”，大会需要保卫，你不能走。我说你们常委分工批彭大会由五系负责，会场保卫工作保卫部有人协助，我非回家不可，我老祖母病了。于是我到学校商店给祖母买了几包饼干，就去了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已人山人海，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胜利归来的大会即将召开。十一路电车到东单走不动停了半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7月26日上午，我赶到了山东老家——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大夫村，见到了老祖母和亲友们。我把村里的造反派们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逼他们赔了礼，道了歉，承认了错误。

我的这次山东之行，躲过了一场大灾难。7月26日这天，“北航”和“地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了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数万人大会，会后游街示众。彭德怀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心身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谢天谢地，这次北航“726”批彭大会，历史老人安排我“不在现场”。

万没料到，事过多年之后的1981年春天，我所在的北京738厂党委接到了一份通天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点名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彭大会的总指挥，并要严肃处理我。

文革以来，中央专门下文件点名整一个青年学生，实在罕见。这令我既莫名其妙，又受宠若惊。

~~~~~  
【难忘岁月】

“一月风暴”中的安徽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六章：“浪尖上的划板”，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走进“一月风暴”

由于一九六七年元旦，我还在去北京的路上，对《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当然不知道。到北京后，忙着反对经济主义，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上、中旬，我在北京所知合肥的文革情况，都是从“八·二七”驻北京联络站和工学院宣传队那儿零星听到的。特别是关于夺权问题，我知之甚少，只听说合肥晚报社印刷厂夺权了。有关上海夺权的事，我一无所知，就连《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样重要的指示我也不知道。

我记不清是元月中旬的哪一天，“八·二七”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通知我，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某省厅，由戚本禹接见在京的外地造反派负责人，我也去了。一来会见时间太晚，二来房子里温度太高，我进去没听几句话，就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会见已接近尾声，只听到有位工人模样的人问戚本禹，工矿企业的权能不能夺？戚本禹的回答很明确：“上海市委的权都可以夺，工矿企业的权当然可以夺”。我当时想的还是揭发省委的问题，脑子里没有夺省委权的意识，所以对戚本禹的话并不在意，没有再往深处想，更没有想省委的权能不能夺的问题。但我也听说合肥不少基层单位夺权了。《安徽日报》和省广播电台的权也被夺了。

由于我一直认为权力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夺权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而元月十八日下午回到合肥。当晚回工大就约“八·二七”兵团副总指挥李胜利第二天陪我到工厂调查夺权企业的生产情况。我们是骑自行车出去的，先调查和平路上的几个大厂。第一站是合肥矿山机器厂。因李胜利是采矿系六九届的学生，他们系在这条路上“与工人相结合”的同学比较多，矿机厂就有十几位同学。他们夺权后，原领导班子的人员并未全换，真正靠边站的是少数。他们的班子基本是按“鞍钢宪法”的组织形式搞的，成立“三结合”的生产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造反派的领导成员，也有表现好的工厂级及科室人员。

技术人员基本未动，车间级的管理干部，本来有不少在“三天流血事件”后就造反了，所以更换得更少。我和李胜利仔细询问了夺权后，各种人员的心态。“八·二七”宣传队的人和“生产管理委员会”等不同人员是这样汇报的：首先分析了造反派的心态。他们原来一直处于受压制，有干劲，没权力。工厂的原领导正像毛泽东所说：“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工人起来夺取了权力，真正体现了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是工厂的主人，他们管的是自己的工厂，尽管他们没有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特权，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特别高。而且，他们还想争口气，把生产搞好给原来的领导层看。站错队的工人群众，也想表现好一些，表明自己过去站错了队，今天已重新站过来。由于基本力量的积极性高涨，各项生产指标都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们顺便到生产车间看一看，从第一线生产工人情绪看，确实喜人。

我们去的第二站是安纺总厂。这个厂过去保守势力比较强大，在这个厂的“八·二七”宣传队好像是工大化工系支队的同学。陪我们一边参观，一边讲解的是“工联会”安纺纵队的头头方杰。由于车间生产的噪音太大，讲话几乎听不清，但可以看得出工人在满负荷地生产。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进纺织厂，印象特别深刻，感到我们的纺织女工劳动强度太大，车间的环境也太差，又吵、又湿、又闷。我们有的同学居然也学会挡车工干的活，而且干得不错。中午是方杰自掏饭票，在食堂排队请我们吃的工作餐。吃饭时，方杰告诉我们，现在科室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差不多都在生产第一线，有问题随时解决。我每天是干两班。如果一线工人都有这么高的热情，什么计划完不成！方杰送我们走时，我告诉他：纺织女工生产环境太艰苦，注意劳工保护，搞好她们的生活，最好通过技术革新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

十九日下午，我们到了合肥钢厂。接待我们的是徐文成，“工联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本来就是劳动模范，活雷锋，废钢收购站的党支部书记，在厂里有很高的威望。由于他的造反，合钢造反派的力量比较大，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情绪也没有激化，所以生产一直不断。夺权后，更激发了造反工人的劳动热情，所以产量不断创新高。直到一九七三年，单季生产量都没达到六七年一季度的水平。因为安纺、合钢都是安徽地方上较大的企业，举足轻重，所以他们管理比较严格，各种指标都有统计表。徐文成和“八·二七”采矿系支队的支队长，将前几年的生产完成情况指标给我们看，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完成情况的确很好。徐还说：“只要保证电力和原材料的供应，钢厂的设计生产能力是四万吨，产量翻番，我不敢说，但一年六万吨还是做得到的。”这时，我插了一句：“为什么以前老是完不成任务呢？”徐说：“道理很简单，工人糊，车间、工段糊，都是等、靠、要，遇到困难谁也不想办法，停了产，还可以歇歇。这样就成了小故障变成大故障，没故障变成有故障。领导又下不来，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下面是干干、停停，停停、干干，产量、质量、品种、能耗指标怎么上去。现在领导就是工人，谁想糊也糊不了，都在第一线”。说着，他指指我们的支队长：“你们问问老孙，是不是这样？”

我们下午四点多钟离开合钢。这一天的调查，让我心里踏实多了。因为这三个厂的情况，我们都看了日报表，与以前的情况也作了对比。中小型企业的情况如何呢？元月二十日，我和李胜利骑着自行车沿蚌埠路看了合肥电机厂，合肥电池厂及合肥日用化工厂。这几个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合肥日用化工厂，他们接管权力近半月，竟搞了三项技术改革。经过两天的实际调查。

有了上述的基本材料后，二十一日上午，我到《新安徽报》社（安徽日报已经被造反派接管，更名为《新安徽报》）去，向他们介绍工厂夺权后的生产大好形势。并且谈了干部游大街的风气不好，使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结果在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同一天，《新安徽报》发表了“游街之风不可长”的评论员文章（见附件八），对全省的游街之风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建议他们能马上到工厂去摸点经验，不要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搞点先进的东西让别人学我们。

## 二．协助省委工作

合肥市第一家夺权单位是《合肥晚报》社印刷厂，也许是因为这个厂印保守派传单较多，印《合肥红卫兵报》时，厂党组织经常刁难，致使工人有看法。加之，厂里领导在十二月二十日后均不负责，工厂瘫痪，承印毛主席语录的任务无法完成。工人们联合起来，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接管工厂的领导权，加班加点提前六天完成承印毛主席语录二十万册的任务。其他夺权单位的情况前面我也介绍过了，省直机关的干部基本都造了反，用任质斌的话说：“连小汽车司机都造反了”。加之李葆华从北京回安徽后，一直留在安徽工学院写检查。张恺帆觉得在工学院比在家安全，也自愿留在工学院。这时可以说，省委完全瘫痪了，整个工作处于无序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大约是元月二十日左右，晚十一点，任质斌代表省委约“八·二七”兵团的主要头

头到稻香楼的一个会议室里谈判。他开始说明省委现在工作很困难，请示中央能否派人来安徽主持工作，周总理的答复是：中央没人派，你们是否可以找“八·二七”的头头们商量，考虑与他们联合办公的问题。并且说：“八·二七”是个长期不发生问题的学生组织。我们当时考虑，总理的指示是对我们的肯定和信任。但同省委联合办公不好实施，还容易引起造反派内部的误解。我们只答应，如果省委工作确实有困难时，需要“八·二七”出面帮助，我们会尽力协助省委工作。（万万没想到，任质斌向我们传达周总理指示的会议，竟成了王力说的李葆华向“八·二七”和平让权的“君子协定”）。我们同意协助省委处理困难问题后，我直接参与以下的几项工作：

1．元月二十一日，我去工学院看李葆华，主要是督促他写检查，尽快向全省人民公开检查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同时顺便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由于我未参加元月二十三日批斗李葆华的筹备工作，所以也不很清楚他们的会议议程。只是到了晚上，葛庆尧（“八·二七”造反兵团常委，合师院的学生）向我传达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批示解放军“支左”的精神：“毛主席批准了二十三日批斗李葆华，要解放军保护会场”的报告，具体内容没看到，听军区的蔺处长（省军区群工处副处长）说毛主席的批示是：“应派军队支持广大左派群众”。并向我介绍了毛主席作出批示的过程：省军区的报告先到南京军区，许世友不敢定，立即转呈中央军委。叶帅（叶剑英）看到后感到事关重大，不敢定，又立即请示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也不敢定，最后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拿笔就做了批示。这当然是件鼓舞人心的大事，等于毛主席肯定了“八·二七”是左派。李葆华是走资派。这场斗争的胜负，在毛主席那里划上了句号。其实，毛泽东主席要安徽省军区第一个出来“支左”的战略意义，不是旨在安徽和“八·二七”，而是在全国。所以，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就是要让全国的左派群众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把由上海发起的“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从安徽推向全国。

2．元月二十三日上午参加批斗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等人的大会。我到主席台上坐了一会，省体育场里，加上两边通道都挤满了人。我怕散会后不好走，就提前离开主席台，回到省政协三楼“八·二七”兵团所在地，观看游行队伍。其实，由于人太多，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站在三楼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李葆华等人被游斗的情况。我当时就暗下决心：这样的游斗仅此一次。我们和李葆华的分歧是政治路线的分歧，我们同他的斗争是路线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同李葆华个人有什么仇恨，为什么拿肉体出气！但转念再一想，群众被打击了半年，现在出口气也可以理解。不过，以后不管什么组织要求游斗李葆华，都以李葆华的安全为由加以拒绝。李葆华在合肥仅被造反派游斗这一次。

二十三下午，由于李葆华被游斗，张恺帆还要参与省委工作。我和张恺帆、周炳山等人乘坐安一2型飞机到凤阳撒传单，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传单是以省委和省人委的名义印发的，意思是要求农民兄弟赶快回家，不能在城里静坐，有问题，省里马上派人处理。飞机是省民航飞行大队陈大队长驾驶的。

3．元月二十四号上午，根据周恩来总理一月十九日接见安徽造反组织代表讲话精神在省政协四楼小礼堂处理“淮南红卫军”的问题。在这之前，听“八·二七”动态组人汇报说：程明远（原省林业厅厅长）将“淮南红卫军”搞到合肥来，他们在合肥乱搞，据说他们抢了安纺总厂民兵的枪支；建设厅的“八·二七”宣传队也报告说“红卫军”将材料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把档案垫在地上睡觉。总之，合肥人对“淮南红卫军”很反感。听到这些消息后，当时也无法去证实，我只是想用和平的办法将他们送回淮南。我怕来硬的会使矛盾激化，他们手里真的有枪怎么办？这又使我联想起解放前，我在河溜镇时，哥哥跟我说过淮南一带土匪很多。又想到周总理十九日讲了“复员、荣退、转业军人联合会，我们不承认。”更坚定送走“淮南红卫军”的决心。二十四日请他们的各路头头到“八·二七”兵团，协商“八·二七”与他们联欢问题。

正在商讨问题时，有人向我报告，他们中间有人身上带枪。我不太相信，就出来亲自验证一下。那人站在小舞台上的一张桌子的北头，三十来岁，长方脸，一米八零左右的个子，上身穿件黑色的衣服，不是棉衣。由于他身上向前微倾，腰间有个盒子炮样的东西清晰可见。就这样，我也不敢断定就是枪，也可能是包，或别的什么东西。我主动过去和他打招呼，他操一口凤台话，我将自己的右臂向他腰间靠近，挤压式的碰一下，感到很硬，这时我基本认定他身上带的就是一支枪。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回到我原来的位置上，向来开会的头头们说：“淮南红卫军”到合肥来与“八·二七”并肩战斗，对“八·二七”的支持很大，我代表“八·二七”兵团和全体战士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春节快到了，我想你们也想回去与家人团聚，“八·二七”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决定今天下午，由兵团宣传队与你们联欢，表示欢送。联欢后，请你们会餐，晚上用汽车送你们回淮南，如果大家同意，就请鼓掌。结果，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用这种办法将几百人的“淮南红卫军”送走了。

4. 二十四日下午，由任质斌、黄岩、王光宇主持召开省厅局长和合肥市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八·二七”兵团参加会议的除我外，还有李文安、葛庆尧等人。由于当时是游斗李葆华的第二天，大街上游行的、报喜的、欢呼的人很多，原定下午两点开会，结果快三点钟任质斌才到。他解释说：“省委机关瘫痪了，连小汽车司机也造反了，我是走过来的。长江路人很多，走小路远一些，来迟了”。接着他问：“合肥市的同志来了没有？”有人回答：“范渦和没来”。这时任很生气地说：“今天的会主要是他发言，他不到怎么行？合肥市的同志赶快把他找来”。正在讲话，范渦和满头大汗赶到会场。任说：“你不要慌找地方坐，先把迟到的原因跟大家说说。”范没有说，“小汽车司机造反方面的事”，而是说，被要求解决问题的群众堵在办公室里。会议开始后，我从范的报告中知道，合肥市的供应马上就要出问题，储备粮只够供二十多天。（规定是在四十天以上）生活用煤，也只够供应两个星期……，到春节也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从黄岩的补充发言中知道，巢湖地区有粮食，但无车运输，淮南淮北有计划内的煤，但没有计划内的车皮。

最后乱哄哄地议论半天，谁也拿不出好主意。因为省委没有权威了，政令不通。这个难题似乎又要落到“八·二七”身上。也正是这天会议，成了程明远在中央领导面前，说李葆华对“八·二七”是和平让权的证据。

二十四日下午会议刚结束，省委又通知晚上在省军区召开紧急会议，由省公安厅汇报凤阳、定远农民暴动问题。程明远及其“红卫军”的问题，还有大、中学校的军训问题。省军区的严光和其他几位负责人基本都到了。开始任质斌和公安厅厅长马静铮也去了。不知什么原因，马静铮和任质斌先后都走了。剩下开会的还有省委的王中（他是分管政法的）和一个姓王的副厅长，还有两位处长。“八·二七”兵团这边有我、李文安、葛庆尧、蒋云章、许燕等，会议是严光主持的，军区有人纪录。开始由公安厅的副厅长介绍凤阳、定远一带农民的情况，后来又提到淮南这些地方的复员军人可能会煽动当地的农民发生暴动，并把这些与程明远的“红卫军”联系起来，情况非常危急，希望省军区动用军队。我当时坚决反对动用军队，我的意见是：由公安厅继续侦查，弄清情况，根据周总理一月十九日讲话的精神，先通缉程明远（因为程明远已不知去向），让“红卫军”群龙无首，不打自散。再由省军区给荣、复、转、退军人写一封信，希望他们回本地区“抓革命、促生产”。严光第一个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军区不能动用军队镇压“红卫军”。最终决定：（1）情况不太确实，都是“可能”不行，要求公安厅继续侦查，把情况弄确定。（2）军区不能派部队。（3）通缉程明远，解散程明远控制的“红卫军”。（4）由省军区再写一封给荣、复、转、退军人的信，希望他们解散组织。

当讨论“八·二七”大、中学校学生军训时，由于太晚了，决定改在二十五日上午再讨论。但二十五日上午讨论的不是军训，而是一件原来谁也不敢想的大事，夺取省委的权力。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